

“河姆渡之祖”与中国海洋文化基因

本报记者冯源、顾小立、郑梦雨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镇”，介绍完地名全称，一位镇干部也乐起来了：“这么多市。”三七市，据地方志记载，因在夏历每月逢三、五、七、十设立集市而得名。眼下，当地即将迎来杨梅上市，据说今年是一个大年。

而对于在这里探索了近7年的考古工作者而言，他们也迎来了一个“大年”。

与三七市相距不远，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而他们此次发现的**井头山遗址**，是中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贝丘，按照《辞海》解释，古代在沿海地区或湖滨居住的人类所遗留的贝壳堆积。其中往往包含有陶器、石器 etc 文化遗物。

要是这个名词还令许多读者感到陌生的话，我们还可以揭示另一个事实：它已有8000年的历史，比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还长了1000岁，是“河姆渡之祖”。

放羊时的意外发现

河姆渡着实有名，有名到“爷爷辈”的井头山遗址，要靠它的知名度重见人间。也因为有了它的祖辈“井头山”，河姆渡遗址才从身世不明的“孤儿”变为血统纯正的“富三代”。

井头山遗址以附近四明山余脉中的一个小山头——海拔72米的井头山得名，而在井头山下，还有一个井头村。村民王维尧和他的堂哥王维新是7年前井头山遗址的“第一报料人”。

当时，遗址所在地块已经被征作工业用地，但是拿到地的老板，还没有动工建厂，因此地面上杂草丛生。王维尧经常来没有封闭的厂区放牧山羊。王维新则在地块的东南角搭了几间猪棚。

不过，放羊养猪的时间也不会太久，这里早晚要开工。老板已经找了一家地质勘探公司，在这里做了土建地质勘探，提取土壤样本。取出一截截土芯，有的就散放在地上，晒干了就像石头一样硬。

2013年10月17日，王家两兄弟照常去放羊割猪草。赶着羊群，他们意外地发现草从里东一堆西一堆地散落着奇怪的东西，有贝壳，有动物碎骨头（后来被专家认出其中有小径鹿角），有小瓦片（其实是碎小陶片）。这些东西，两人之前从来没看见过。



▲井头山遗址出土的大量贝壳。 本报记者冯源摄

进一步调查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政策措施。

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出资2500余万元回购了这一地块。对此，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研究员评价说，要解决如此难度的土地赔偿问题，全国其他大多数地方很难做到。

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大力支持井头山遗址的发掘，面积800平方米。但在发掘之前，特殊的地质环境是个拦路虎。

“由于井头山遗址埋在地下5-10米深，上面是厚厚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动坍方。我们决定在实施考古发掘前，预埋钢结构围护的发掘基坑，这样才能确保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以及人身和文物的安全。”孙国平回顾说。

2018年3月，杭州东通岩土科技有限公司中标了钢结构围护基坑施工项目，并于2019年8月艰难地完成了这个非同寻常的基坑工程。

在现场，记者看到，一根根钢板桩深扎地下，围成了一道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墙铁壁”，竖直的钢板桩间还有横向的钢梁支撑加固。在南北之间，有4道钢梁连接；而在东西两头，又各有一组“人”字形的钢梁，“人”的上端分别顶住东西两端钢墙，“一撇一捺”又牢牢地固定住南北，而这组钢板桩围成的基坑，其底部最深离地面约为10米。

“钢板桩每平方米要承受20吨的重量，要打入地下岩层3米深。”东通岩土科技公司技术总监、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浙江大学博士胡琦说，考古基坑不像一般的基坑，为了保护遗址现场和其中的文物，既不能运用大型机械施工，也不能灌注水泥或混凝土等有腐蚀性的材料，围护结构不能封闭，基坑底部也无法封底，基坑暴露时间较长，对长期稳定性要求更高。

“在国内还没有哪家同行接手过这样的考古工地项目，我们采用了H型钢和U型钢作为围护桩，再作了一道预应力型的钢组合支撑。”胡琦介绍说，整个基坑围护结构均为工业化生产的预制钢构件，使用的是他们自主研发的装配式基坑围护新技术，力求安全可靠、施工扰动小。与传统围护方式相比，它可以避免用水泥、混凝土等材料，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对文物的影响。

“广东‘南海1号’沉船是整体打捞出水后搬入室内进行考古清理的，四川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则是在江上建设围堰先把水排干，井头山遗址则首次在文化层超大埋深的沿海滩涂环境下，成功建造钢结构围护基坑后实施考古发掘。它们都是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开展特殊对象考古发掘的经典范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员回顾这一过程时说。

中国最早的沿海渔民

从2019年9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在井头山遗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发掘。在基坑内，考古队员按照5x10平方米的规格布方，目前已完成主要探方的大部分发掘工作量，发现了灰坑、柚子储藏坑等遗迹，烧土堆、烧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处理点等遗迹十多处，出土各类可登记遗物数百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废弃的海量贝壳遗存和其他动植物遗存。

“现在的遗址区是海拔仅2米的宁波沿海平原的一角，其实在8000年前，这里是一座西高东低的小山头的坡地，面朝古海湾，井头山人居的村边每天见证着东海的潮涨潮落，只是后来经历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积，山头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了。12米长的钢板，底端打到的岩层其实就是当时的山岩。”

孙国平告诉记者，**基坑里的地下古村落文化层堆积**，西薄东厚，到最东边的古代滩涂位置又逐渐变薄直至消失，各类零散遗物夹杂在含盐度较高的海相淤泥里。“其实你可以把井头山

先民居住的环境想象为一个渔村，他们住在海边的山脚上，如果海面上涨，他们就往山上退；如果海面下降，就往山下走。最东边就已经是当时的海面了。”

井头山地处姚江流域。姚江从南边的四明山区发源，流到山下后，又被北边的丘陵阻挡，折而向东，在宁波市区注入甬江，汇入东海。在余姚境内，姚江流域近似于南北两山夹平原的地形。孙国平说，井头山先民生活的年代，南北两山之间不是平原，而是海水。“我之前去挪威，看过当地的峡湾，其实8000年前，井头山的周边地形，也像一处峡湾。而现在宁波的平原地带，则是一个海湾，可以叫它‘古宁波湾’。后来海水后退了，才露出了平地。”

在这样的环境下，先民们显然先得靠海吃海。在基坑里，记者看到土层里夹杂着一层层的贝壳。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门外的走廊上，一排排装满各类贝壳的塑料箱摞了两三层高。而在两大间库房里，各种海生贝壳的两壳摆满了“好几桌”，特别是那些巨大的牡蛎壳，大的足足有餐桌上的菜盆子那么大，由此想象一下，足以让现代的老饕们垂涎三尺。

“目前，我们发现的贝类中，牡蛎最多，其次是蚌、螺、蛭、蛤，都是纯天然的。”孙国平说，这里是浙江首度发现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史前贝丘遗址。

在库房里，考古队员还用有机玻璃罩罩住了一个小土墩，上面是草编的痕迹，从它的形状看，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贝的簋子、簠子。而在基坑里，记者也同样看到了这样的芦苇苇类编织材料的小“土墩”。

孙国平推测说，它可能是用于滩涂浅水区捕鱼的工具，鱼被渔民罩住后，就容易抓住了，现在沿海渔民有的还在使用它。“我们还发现了大量的海鱼耳石，根据动物考古专家研究，这样的海鱼大多需要划船捕捞。”

“这里生活的先民是中国沿海最早的渔民，创造的是中国东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东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文化的重要来源。”在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专家论证会上，福建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评价说。

时间回溯到2013年10月，考古队员们为什么对王家兄弟带来的一袋泥土如此关注，是因为它可能是一把解答“河姆渡文化起源”的钥匙。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后，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杭州萧山的湘湖岸边发现了跨湖桥遗址。据碳十四测年法，它距今已有7000-8000年的历史，比河姆渡遗址也早了1000年。但是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工艺特征看，它似乎应该比河姆渡遗址要晚，难道是测年有误？这个问题困扰了大家很长一段时间。

而井头山遗址出土的样品，经北京大学碳十四实验室、日本东京大学实验室、美国贝塔实验室、南京大学新建碳十四实验室等进行测年，得出的结果都是距今8000年上下，最早的距今8300年左右。

“你看这件陶器，口子边有两个小耳朵（把手），这个是‘遗传密码’，不会错的。”孙国平幽默地说，**从各方面判断，井头山是“河姆渡的爷爷”**，而此前考古界关于跨湖桥的疑惑也可以释然了。

众所周知，河姆渡遗址以稻作农业遗存著称，而井头山遗址也发现了少量稻作遗存。在考古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郑云飞研究员正在用双筒显微镜仔细观察淘洗出的稻作遗存。

“两升土，两天时间，找到了2600个小穗

它是“河姆渡的爷爷”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不过，井头山遗址还没有完全解答河姆渡源头之谜，因为有一个“爸爸去哪里”的缺环。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表示，井头山到河姆渡中间还有个空档，需要进一步研究。孙国平则进一步框定了这个缺环所处的年代，也就是距今7000年至7800年间，而河姆渡文化的直接来源也应当在余姚和宁波本地已无疑。

“目前，我们基本明确了钱塘江南岸的文化序列，是上山-跨湖桥-河姆渡-良渚。”良渚古城发现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研究员表示，后续工作是将这一区域内的文化谱系与其他区块内的文化谱系，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上能够对应起来。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向东是大海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轴。”从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郑云飞说，小穗轴是稻谷与稻秆小枝梗的连接部位，野生稻会自然脱粒，而人类驯化后的栽培稻则不会。在标本中，一些小穗轴和稻壳连在一起，说明这些稻谷应该不是野生稻，而是不会自然脱粒的栽培稻。这对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能够提供更多佐证。

追怀家乡先贤俞秀松

俞燕

我小时候，爷爷常常说起，浙江诸暨次坞镇有一位非常出名的革命烈士，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创建，诸暨很多人都是在他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就是俞秀松……那时候特别崇拜英雄人物，就对这位英雄前辈特别好，总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故事。

后来知道了俞秀松的故乡在溪埭村，离镇上也就七八里路，于是多次去了先烈故里，也渐渐对俞秀松有了深入了解。在溪埭村东口，一眼就能望见俞松烈士碑所在的地方，名为柏树山头的小山丘，四周松柏苍翠。1999年，在俞秀松100周年诞辰之际，这里建成了俞秀松烈士陵园。从村口起，一条笔直的道路延伸，山脚有之字形门阶，“俞秀松烈士陵园”七个大字赫然在目，下用白色大理石镌刻俞秀松烈士生平介绍。拾级而上，就是陵园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九个大字。远望纪念碑，静静伫立于青翠丛中，显得格外庄重肃穆。

一面是谦儒，一面是刚烈，面对马克思主义真理，俞秀松如烈火般奉献。父亲俞韵琴对俞秀松的品性塑成有着极大的作用。在以“耕读传家”闻名的诸暨，受父亲影响，俞秀松和其兄弟姐妹均为人正直刚毅，富有同情心。五四运动时，深受先进思想引领的俞秀松成为杭州青年运动领袖，后与同学董中华、陈寿丞等一起创办《浙江新潮》，以战斗的姿态对当时的制度和封建礼教进行猛烈抨击，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俞秀松曾言，“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铁骨铮铮由此可见。

当年，俞秀松怀着“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东西南北的人”之梦想，离开了家乡，前往杭州、北京、上海、莫斯科、福建、广东、新疆等地寻找革命真理。临行前，他对前来送行的弟弟俞寿丞说：我要等到讨饭也有饭吃再回来。可是，他为了毕生理想食言了，经此一别，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五四运动在杭州的组织者，和陈独秀之一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发起人之一，他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中国共青团首次出席莫斯科共产党“三大”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代表，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做出过卓越贡献。

他一路高举火把向前走去，走进荒芜，燃起燎原的星火。

1935年6月，俞秀松受联共（布）中央委派进入新疆，做新疆督办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成为在新疆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在新疆，他做了两次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第一次募了17架新疆号飞机，送到湖北武汉战地。第二次募捐了5万匹军马送到延安，支援抗日前线。

俞秀松与张秋人等诸暨籍革命家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觉悟年代》、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记载，女革命家钱希均专门谈到俞秀松、张秋人的革命情谊，她回忆了当时和张秋人一起送俞秀松去苏联的情景：“我和秋人送他上轮船，我记得他穿一套咖啡色中山装，很有气派。在轮船上，他给秋人再一次交代工作，有哪几个区要加强团的工作……秋人对秀松说：你对苏联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健康，这里的工作请放心。”

家乡人对俞秀松充满怀念。村里的俞秀松故居，坐落在一条铺着青石板、两个白墙黛瓦的小巷中。这幢建于晚清时期的四合院式楼房，得到了很好的修缮保护。故居里面，有俞秀松生平事迹陈列室、俞秀松半身铜像，另有老宅的旧家具等，陈列室有毛泽东签发的《革命烈士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虽是复制件，资料内容亦弥足珍贵。

在俞秀松家乡次坞镇，除了烈士陵园、故居外，还在烈士陵园内修建了俞秀松纪念馆，使俞秀松烈士陵园成为长三角地区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镇里建有俞秀松党史教育主题公园，公园里有宣誓楼、党建故事墙、红梅亭、先锋长廊、党史之路、红领中长廊等，还把当地初中改名为秀松中学。在诸暨市区陶朱山上，有一座8米高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山腰的诸暨烈士纪念馆中，陈列着俞秀松等革命烈士的照片及革命活动时的图片和遗物。诸暨烈士纪念馆也是浙江省内著名的红色旅游景点之一。在诸暨母亲河浦阳江畔的沿江公园内，还建有俞秀松、俞侯文、张秋人、董中华、汪寿华、复他等革命先辈的半身石雕像。

去年是俞秀松120周年诞辰，笔者牵头策划了两件跟俞秀松有关的事：一件是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俞秀松120周年诞辰研讨会，除了研讨活动外，现场还举行了《俞秀松画传》首发赠书仪式，另一件是策划组织大型电视访谈节目《丰碑永恒》，对俞秀松等6位诸暨籍先烈的事迹进行展示，邀请先烈后人 and 专家学者到现场访谈。

一脉赤子之心映照中华大地，生为松柏化成甘霖。先烈留在家乡的印迹除了保护，更应该传承和弘扬。

大家从田螺山扛来了他们常用的不锈钢细探针。它一头形如“十”字，一头是带有凹槽的尖探针，可以把地下的东西卡在凹槽里带上来。4个人在地上压住“十”字的四端，1个人在坑底握紧探针，齐心协力往下压。又往下钻了3米多深，探头被硬东西卡住了。

手感告诉孙国平，卡住它的不是石头，而是贝壳，才知钻头下面触及的贝壳距离地表面深度约7米。此后，他们又在其他位置，用机械设备钻探出了贝壳、动物骨头、陶片、残骨器……这些发现立即引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视，随后，研究所又把这一重要发现汇报给浙江省文物局。

2015年5月，浙江省文物局向余姚市人民政府正式发函，要求当地政府协调和落实井头山遗址